

外国文学学刊

第三辑

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

一九八四年三月

PDG

目 录

法国文学研究

论 左 拉

- 有关左拉的几个问题……………刘 煜 (1)
一部表现工人运动的小说——《萌芽》
……………龙怀珠 (14)

论萨特

- 萨特的人道主义……………邓丽丹 (29)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杨昌龙 (41)

论特罗亚

- 特罗亚及其《埃格雷蒂埃尔一家三部曲》
……………张成柱 (62)

年表

- 巴尔扎克生平创作年谱……………苏成全 毛含德 (72)

外国作家与作品

-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生活……………唐民权 (118)
磨盘间的小人物

主要人物形象

- ……………陶玉平 (130)

幽默·悲愤·壮美

——读茨威格《看不见的珍藏》

.....陶玉华 (138)

苏联的文学研究译介

法捷耶夫是怎样创作《青年近卫军》(波波里金)

.....李四海 译 陈孝英 校 (144)

安德里奇的历史小说(克尼帕维奇)

.....陈斌 译 (164)

三仲马与安德烈·莫洛亚(安德烈耶夫)

.....曹介民 译 (183)

编者的话

简讯 (202)

编后记 (204)

有关左拉的几个问题

刘 煜

一、左拉之死

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左拉在巴黎近郊的梅塘别墅度过夏天后回到巴黎布鲁塞尔街二十一号的寓所，遇到天气潮湿，他的夫人身体不好，晚间燃烧卧房内的壁炉，睡眠以后，因为壁炉的烟囱阻塞，煤气倒灌进来，使左拉夫妇和房内的那条小狗一齐中毒窒息。次晨十点钟，仆人破门而入才发觉了，经过有力的抢救，身体病弱的夫人和那条小狗都救活了，只有身体素健的左拉没有苏醒过来。当时警察局的检查报告判定他是煤气中毒的自然死亡，报纸也照此披露，这一点差不多就成了定论。

左拉到底是自然死亡或是被人谋害，当时就有过议论，有人怀疑。当报丧人出现在左拉的情妇让娜·罗泽罗的面前时，还没有开口，“她立即预感到发生了一件大不幸事，失声惊呼：‘别人把他杀死了吗’？”⁽¹⁾这种事是官方说了算数的；但是，人们记得，德雷菲斯上尉是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判终身劳改的，一八九九年五月，诬告犯亨利上校服罪并在陆军监狱自杀，真相大白，七月一日，德雷菲斯从魔鬼岛被押回重审，又被军事法庭揪住不放，判定有罪。九月十九日才由总统卢贝下令特赦，把一个受诬告的无辜者

当作被特赦的罪犯，充分暴露了反动政府的黑幕。在这样的
是非颠倒、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坚决为这个大冤案平反的左
拉的真正死因，还有可能加以认真的调查吗？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阿拉贡在左拉逝世四十五周
周年纪念会的致辞中提过，在德雷菲斯的风暴时期，便发生过
保皇党徒和军部走狗暗杀为左拉和德雷菲斯辩护的律师的
事……一九一四年，过去全力支持左拉的著名社会党人让·
若雷斯⁽²⁾被法西斯分子枪杀身死……一九四六年被暗杀的
还有当年的德雷菲斯派维克多·巴雪⁽³⁾。人们知道，左拉
在《金钱》中，曾揭露以拿破仑第三的总理大臣卢贡为首的
官僚资本集团和以龚代曼为首的犹太金融集团间的斗争，反
动派为了把色当惨败归罪犹太人，制造了犹太血统的德雷菲
斯出卖国防机密的大冤案，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犹运动，这
和以后希特勒上台后的反犹运动如出一辙。这一根法西斯的
黑线，从拿破仑第三一直贯穿到维希政府，阿拉贡揭露的一
系列法西斯分子暗杀事件，从侧面说明了左拉的真正死因。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国《译文》的世界文艺动态栏首次
介绍了法国龚古尔学院院士阿尔芒·拉努的新材料，断定是
“当时反动集团收买了几个人，预先布置好把左拉卧室的出
烟孔严密地堵死，以便谋杀左拉，报复他对‘德雷菲斯事件’的
干预，以及他的整个社会和文学活动。”⁽⁴⁾同年，对左拉深
有研究的林如稷先生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关
于左拉的死》⁽⁵⁾，认为“左拉的确是中煤气毒死的，向来
大家只慨叹这不幸的意外。但最近法国文艺学家阿尔芒·拉
努却提出了一个可惊的说法。阿尔芒·拉努在所作的《左
拉》⁽⁶⁾一书的英译本中，增加了法文本所没有的一章，引

用许多至今没有人知道的材料，证明这是一件阴险的政治性谋杀事件。”最近，在一九七八年法国法斯凯尔最新版的《人的兽性》的序言中，也提到“谋杀的动机不能排除。”⁽⁷⁾

左拉逝世已经八十年了，逝世现场已经不存在，相关的人也早已下世，不可能重新调查，重新定案，但左拉被法西斯毒害的疑团，一直，也许永远，存在于人民心中。这是坚持正义的人的悲剧，也是真理正义本身的不幸。

二、“实验小说”的空想

左拉“实验小说”的文艺观是一八七九年定型的，当时《娜娜》已在《伏尔泰杂志》连载，可见这一观点有一段孕育过程。

自然主义一词，早在十七世纪就在哲学上出现了，它本来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在反对唯心主义的唯灵论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后，它逐渐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但在文学上的反映，还要迟到十九世纪的后半期。

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法国文学出现了两个极端：侧重主观的浪漫主义到雨果已经发展到顶峰，开始向“为艺术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便是泰奥菲尔·戈蒂埃⁽⁸⁾首倡的唯美主义和相继出现的象征主义以及后来的颓废派；偏重客观的现实主义到巴尔扎克也已发展到了顶峰，开始倾向于用精确细致的科学方法处理文学题材，这便是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包伐利夫人》（一八五七年）的作者在他这部小说中树立了典范，这位现实主义大师认为小说艺术到十九世纪应同当时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取得一定的科学真实并原原本本地复制生活，“把生活制成标本，用酒精浸在瓶子里，拿

出来展览——这就完了。”⁽⁹⁾随后，龚古尔兄弟发表了他们的小说《热尔米妮·拉耜特》(一八六四年)，刻画细致入微，被目为自然主义小说的第一部。左拉要到一八七六年发表《泰雷兹拉坎》时才在序言中首次自称为自然主义小说家，并在一八七九年发表《实验小说》，具体阐明了他的小说观点。由于观点上的一致，导致了一八七四年由福楼拜、阿尔封斯·都德、埃德蒙·龚古尔、左拉和当时常住巴黎的屠格涅夫组成的“五人聚餐会”，也导致了一八七九年由左拉、莫泊桑、于斯曼、赛亚尔和保尔·亚力克西结合的“梅塘派”。后面五个人合写的《梅塘夜话》在法国文学史上之所以著名，就是它被看作自然主义的宣言书，那已经是一八八〇年了。从此以后，自然主义就形成了一个流派，不仅影响法国，而且在全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实验小说”理论根据有三：一是孔德主张的哲学应以“实证的”、“确实的”事实为根据的实证论，二是泰纳主张的把自然科学方法用于文艺创作中的决定论，三是贝尔纳在《实验医学绪论》中主张的遗传论。根据这三个论点，左拉认为，“当代的小说家必须是某种形式的科学家，要象实验科学家那样老老实实在地‘观察’现象。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把几种物质(人物)放在适当的容器(环境)中，使之接触，自己不再干预，退后一步，单纯地记录下各种不可避免的反映。”⁽¹⁰⁾于是，左拉为他写的《卢贡——马卡尔家族》预先设计了一个谱系表，对每个人作了象法院医生那样的记录：遗传的瑕疵、预伏的病源、心理及生理上的影响，都记得非常清楚。这种事先安排了框框的演绎法，使“实验小说”的理论，同实证主义哲学一样，从机械唯物论开始，又陷入

了主观唯心论。

的确，左拉的理论和实践是存在着矛盾的。从理论上讲，酗酒的遗传，是贯穿《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一条线索，但作者拿着这条线索，却常常套不上框框。例如：在《萌芽》中，酒鬼马卡尔的后代艾蒂安说“他只要喝两小杯酒，就需要吃掉一个人……”。⁽¹¹⁾但他喝醉酒时并未杀人，真正杀人，倒是滴酒未沾、困在井下、受到情敌挑衅的时候。作者抛开了自然主义的遗传规律，仍然落到现实主义上；不是意料之中，而是情理之中。因此，智利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认为“纯粹的”自然主义（也就是真正的“实验小说”，）在法国文学里根本就不存在。原话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认为自然主义是一个有硬性原则的文学理论，认为爱弥尔·左拉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他们就该立刻承认拉丁美洲就总的方面来说，没有受到这个文学流派和这位文学大师的影响。可是，只要我们承认左拉的文学理论同他的小说著作之间存在着一条大的鸿沟，承认就在法国评论界中也有各走极端的看法……那末，我们也就应该承认他对拉丁美洲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因为，‘纯粹的’自然主义在我们的文学里并不存在，在法国文学里也不存在。”⁽¹²⁾

自然主义是从现实主义派生出来的，都著重如实地揭露资本主义的丑恶的现实；“纯粹”的自然主义在法国文学文里不存在，把生理学和遗传学运用到文学上的“实验小说”理论，到头来只是左拉自己也不能贯彻的空想。

三、左拉在中国

左拉在世的时候，每发表一篇小说就要引起一场争论，反对的和赞成的都异常之多，每有一部小说改编成为戏剧，一上演就是嘘声彩声此起彼落，这在法国文学史上的确少见。

赞赏他的可能也有敌人：一八七七年《小酒店》发表，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受到反动派的极大欢迎，这些人“乐于保证这部小说获得成功，因为他们看到曾经使他们自己发抖的工人阶级被描写成令人恶心的酒鬼，深感高兴。”（13）

反对他的也许还有朋友：一八八七年土地发表以后，左拉的同行好友龚古尔和都德就怂恿青年作家博纳坦、罗斯尼、德卡夫、玛格丽特、居斯塔夫·吉什发表一篇有名的《五人宣言》，载于一八八七年八月十八日的《费加罗报》上。他们说：

“左拉自从著了《小酒店》以后，我们看见他那样刚强勇敢，可以补救在那样文学界的懦弱的毛病，所以我们爱他，就是爱他的勇气。谁料到《小酒店》出版不久，他便做错了些事情。……我们希望他的《土地》出版之后可以慰我们的热望！现在竟令我们失望了。非但他的观察是不着实的，非但他的描写是平庸而欠个性的，而且他的笔墨的淫秽竟达到极点，有的时候竟令人疑是一部海淫的书，唉！我们的大师竟到了卑污的地方去了！……”（14）

这样争论不仅是法国有，其它国家有，在我国也同样存在。

左拉作品传入我国，最早恐怕是译过大量欧美文学作品

的林琴南。一九一七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书》中也有左拉的作品。《卢贡——马卡尔家族》译介到我国的第一部，也许要算王了一同志一九三〇年在巴黎开始译的《娜娜》了。我国文学界对左拉的反映不坏，郭沫若同志在一九二三年曾表示过他的看法：

近代文学的精神无论如何都系胚胎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近虽衰夷，然而印象派中、象征派中、立体派中、未来派中，乃至最近德意志的表现派中，都有自然主义的精神流贯着，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自然主义的精神在镇密的静观与严峻的分析……”（15）

郭老肯定了左拉作品中积极的部分，这同高尔基对《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评价差不多。高尔基说：

“你们提出左拉。左拉是另一类型的人。他通过自己的长篇小说创造了第二帝国的很好的历史。他象只有艺术家才能做到的那样叙述了这部历史……总之，他知道一切，他知道那个最初在十九世纪获得胜利、后来又戴着胜利的桂冠腐败下去的资产阶级的全部掠夺的历史和全部崩溃的过程。”（16）

在我国，近些年来，由于批判“缺德文学”、“暴露文学”、“伤痕文学”等的关系，好些文章和言论都拉扯到自然主义，似乎一个世纪前那位法国自然主义大师写下的世界传诵的著名小说，倒成了流毒我国的错误典范了。

有同志把自然主义说的异常可憎，引用了鲁迅的话，说鲁迅先生说过：“自然主义的描写只能使人感到象‘吞下一个活苍蝇’那样难受。”（17）这，未免言之过甚，很难令人

信服。

有同志说，“自然主义否定文艺可以对生活进行概括，否定作家可以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思想倾向。”⁽¹⁸⁾实际上，左拉爱憎分明，下笔自有分寸，倾向明显，对比鲜明，只不过没有把好的说成绝对的好，坏的写成绝对的坏。

有同志说，“自然主义看待生活是孤立的，静止的，它描写某人、某事、某地同整个社会毫无关系，因此自然主义看待生活是僵死的。”⁽¹⁹⁾实际上，《卢贡——马卡尔家族》又名《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它们同社会的联系既很明显又很广泛。

总之，这样的论调和文章相当多，甚至有些同志在批评曲艺相声的不好作品时，也笼统统统地归罪自然主义。我怀疑那些相声作者是否想到这个文学名词，是否读过左拉的巨著，是否当真受到影响；如果没有，他们受到这种没头没脑地批评，吆喝他们在搞自然主义，一定会摸着脑袋，连声：这、这、这……

的确，自然主义有很多缺点，左拉死后即已衰夷，但它和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一样揭露的是反动社会的“伤痕”，“暴露”的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我们不能在恭维批判现实主义时把功劳只归巴尔扎克，也不能在批评“伤痕文学”时，把罪责全归左拉。阿拉贡认为“左拉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是我们唯一能够跟巴尔扎克相提并论的或仅次于巴尔扎克的小说家。”⁽²⁰⁾如果扬巴抑左，天上地下，似乎又象在李白杜甫之间一样作了过头的褒贬。

左拉的作品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广泛流传，不断重译出版，法国从一九七八年起又在全部重印，受到攻击最多的《娜

娜》已被编成共有十四集的电视片，在法国电视台播映。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法国《世界报》曾加评论，认为左拉“非常真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那个巨变的时代，到今天还没有过时，他描绘的那些人物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21）

左拉已经逝世八十年了，法国读者正在重新重视和评价他的作品，我们似乎也应该对他的理论和作品陆续作出实事求是的研究。

四、向左拉学习什么？

“实验小说”早已过时，不足取法，但高尔基仍“喜欢龚古尔兄弟的象钢笔画那样刚劲、清晰的作品，以及左拉用暗淡的颜料描绘的晦暗的画面。”（22）除了这种描绘的技巧外，左拉还有不少值得人学习积极的的东西。

首先，他是一个坚持真理正义的坚强战士。

在法国文学史上，伏尔泰也曾两次挺身而出，为“让·卡拉斯冤案”（23）和“皮埃尔·西尔旺冤案”（24）平反，但这两次事件都是天主教对新教徒的迫害。当时已是十八世纪后半期了，资产阶级已经壮大，大革命迫在眉睫，代表封建主义的天主教会正且战且退，为宗教冤案平反的阻力不大，这和左拉在“德雪菲斯事件”中面临的严峻局面大不相同。左拉在连续多年的斗争中，受到法院的审判，遭到侮辱的狂流，淫秽的诽谤，各种的威胁，仇恨的责骂，处死的吆喝，因而被判刑、被罚款、被迫逃往英国，但坚贞不屈，继续斗争，绝不动摇，这种大义凛然的斗争精神，为全世界的文学家树立了可贵的典范。

其次，左拉爱憎分明，没有模糊敌我界线。

当《萌芽》出版的时候，照例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作者受到各式各样的攻击，有的甚至达到了平庸可笑的程度：

“最可笑的批评中须提及那位瑞士人觉得‘波纳摩尔（书中人，现译善终老爹）吐唾黑色是不适当的！还有个字也不适当：creVer（死）！同样，加特林（书中人）的肘子支住爱吉纳（书中人）的肚腹也不对，最不道德的是爱吉纳想亲抱加特林，而尤为不道德的是沙瓦列竟亲抱了他。’左拉照素常的习惯把所有的批评都丢开不管，只对责备他的粗鄙的却忍不下，于是在《费加罗报》里傲然地加以抗辩。”（25）

左拉女儿在她写的《记爱弥尔·左拉》中，也曾提到这件事，那是左拉致报纸主编弗朗西斯·马尼亚尔先生的公开信，原文如下：

“……有人责备说我们对那些曾使我眼睛充满泪珠的可怜人，只知道用污浊的虚构和预定的谎语去描述他们。对于每一个责难，我都可以拿出一个证据来答辨的。为什么别人说我诽谤可怜的人们呢？在我仅有一个期望：把他们照我们的社会把他们弄成的原样如实地指示出来，并想因此去引起那样一种惻隐之心，那样一种公平的呼声，以便使法国终于不再让小小一群政客去吞噬它，而能够来照管它的子女们的健康和幸福

再次，左拉不搞一刀切、绝对化，而是下笔处处有分寸。

自然主义文学家常常被认为是一面在路土奔跑的镜子，浮在表面，说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不但不应参加当前的斗争，而且应当对于人类的各种情欲保持局外人的态度，以便更好地去描写他们：做个石头人，为了更好地欣赏生活！”（277）的确，从理论上讲，左拉也想象临床医生那样客观地观察社会，但医生到底是人，人是有感情的，不可能是没有感情的石头人或镜子。

例如，在《萌芽》中，左拉的确象照相一样，既照了煤矿工人男女关系混乱的情况，也照了总经理夫人到处偷人的丑态，但他拍下的工人镜头是住地恶劣，男女杂居，没有任何娱乐，因而使青少年先同居生孩子后才结婚，作者的目的显然在控诉社会不公，这与老板娘终日饱食，闲得难过，因而到处偷汉子，甚至乱伦勾引比她年轻十几岁的外甥，二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对资本家格雷古瓦一家，作者揭露了他们寄生虫样的过份舒服的生活，同工人的贫困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没有简单地把他们写成“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特别是那个真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矿工程师内格雷尔，更是处理得合情合理：这个人在生活中有个别作风不正之处，在工业危机到来时曾压低工人包工的工价，但在工作上严肃认真，不仅严格要求工人，也严格要求自己；他天天深入井下，每次发生事故，他总是第一个先赶到现场，毫不畏惧压碎骨肉；矿井崩塌被淹，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坐在木桶内降到深井，勘察原因；抢救工人时，他天天住在井下指挥，忘了吃饭，忘了睡觉，直到挖通坑道，救出了半死的矿工艾蒂安，这两个在罢工中的死对头流着眼泪拥抱在一起了。读者读到这里，眼泪也会夺眶而出，这是对绝大多数知

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哪里是冰冷无情的照相术！左拉作品之所以具有现实意义，之所以具有“令人惊异的生命力”，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左拉勤奋的创作精神也值得们我学习。他在三十年的创作生活中，夜以继日，写下的作品已出版的共六十四部，另外还有未完成的书稿以及书信、日记、笔录、札记之类，数量很大，有的保存在国立图书馆，大部分散失在外没有收集，充分证明他是一位勤奋努力的多产作家。

注：

(1) 见林如稷译《卢贡家族的家庭》一九三六年商务版八十九页。

(2) 让·若雷斯（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四），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在德雷菲斯事件中曾全力支持左拉。

(3) 见阿拉贡的《左拉的现实意义》，盛澄华、林秀清译，载《译文》一九五六年十一期，关于维克多·巴雪的生平，待考。

(4) 见《译文》一九五六年五月号一九六页《左拉的真正死因》。

(5) 见《长江文艺》一九五六年第八期七十一页。

(6) 这里引用的可能是阿尔芒·拉努一九五四年发表的《您好，左拉先生！》

(7) 见一九七八年法斯凯尔版《人的兽性》序言第一页。

(8) 泰奥菲尔·戈蒂埃（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法国诗人，他在一八三八年发表的小说《莫班小姐》的序言里首次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9) 转引自《也谈“写事实”这个口号》，一九八〇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

(10) 引自英国坦科克一九五八年《萌芽》英译本《序言》第六页。

(11) 见《萌芽》一九五八年法国法斯凯尔版第四十七页。

(12) 见阿莱格里亚《拉丁美洲小说史》一九五九年墨西哥版第十八页。

(13) 见罗大冈译拉伐格《文论集》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一二四页拉伐格注(1)。

(14) 引自王力《左拉与自然主义》，一九三四年商务版《娜娜》十七页。

(15) 见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出版的《草堂》第三期郭老自日本的来信。

(16) 见高尔基《论文学》，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三〇八页。

(17) 见一九八〇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不能只强调‘怎么写’而忽视‘写什么’”。

(18) 见同日《人民日报》“也谈‘写真实’这个口号”。

(19) 见一九八二年三月九日《文汇报》“这是自然主义吗？”

(20) 见阿拉贡《司汤达的光芒》。

(21) 见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文汇报》“世界文学之窗”。

(22) 见高尔基《论文学》一八三页。

(23) 让·卡拉斯为法国图卢兹商人，被诬告为了阻止其子脱离新教杀死其子，一七六二年被该市议会酷刑处死，一七六五年伏尔泰为之平反昭雪。

(24) 皮埃尔·保尔·西尔旺是个新教徒，于七七六四年被诬告阻止其女皈依旧教杀死其女被图卢兹议会判处死刑，五年后伏尔泰为之平反昭雪。

(25) 见波目著《左拉的〈萌芽〉的新评》，载一九三五年《译文》二卷四期，马宗融译。

(26) 见林如稷译《卢贡家族的家庭》五五页。

(27) 见拉伐格《文论集》一三九页。

一部表现工人运动的小说《萌芽》

——兼论对左拉和自然主义的再认识

龙怀珠

《萌芽》(1885)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小说家，自然主义理论创始人爱弥尔·左拉(1840—1902)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第一次生动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劳资双方殊死的斗争，充分表现了左拉文学创作的风格，不失为世界文苑的一枝奇葩。

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劳资矛盾尖锐，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纷纭。这时，“似乎已经认识了工人群众的政治经济力量”①的左拉，表现了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更强烈的兴趣。一八八四年二月，法国北部昂赞采煤工人的大罢工，引起了左拉高度重视。他立即赶赴罢工现场，做了大量调查访问，迅速投入创作。很快，这部在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品——《萌芽》②就破土而出了。

在《萌芽》的创作提纲中，左拉写道：

这部小说是要表现工人的愤怒。是对社会的一下冲击，使社会为此而震动。总而言之，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它宣告将来，提出一个将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问题。……”③